

清代扬州学派 经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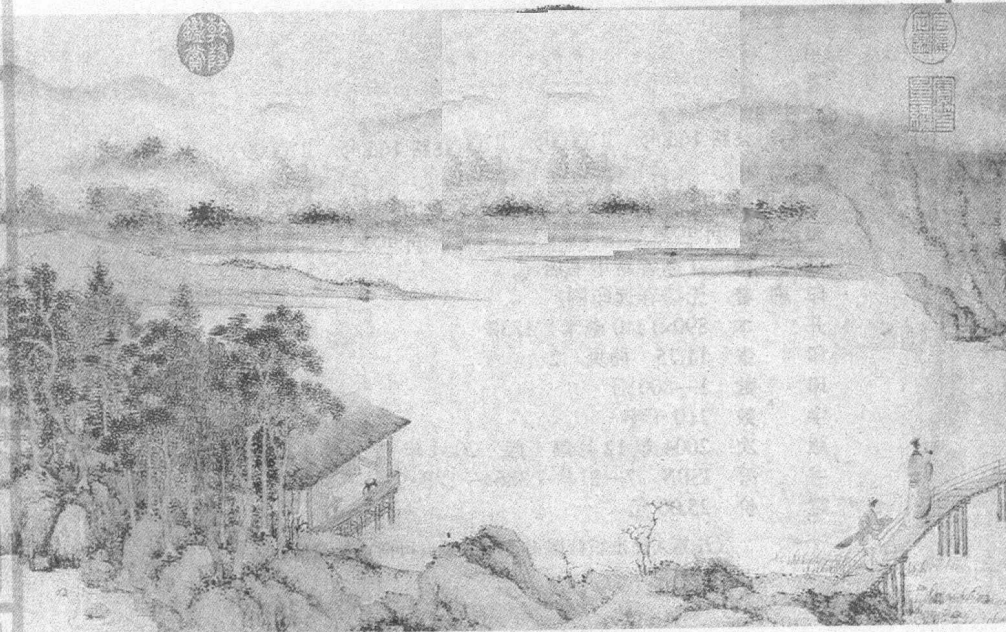
● 刘建臻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刘建臻

清代扬州学派 经学研究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刘建臻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9

ISBN 7-214-03864-1

I. 清... II. 刘... III. 经学—学术思想—研究—中国—清代 IV. B8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6497 号

书 名	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
著 者	刘建臻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无锡春远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1.75 插页 2
印 数	1—800 册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4—03864—1/B·9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

扬州学派研究,为清代朴学研究重要内容之一。清儒惩明季士大夫“空谈心性”之弊,崇尚实学,号为“朴学”。钱大昕为王鸣盛撰《墓志铭》云:“堂堂光禄,朴学是好。”朴学,乃乾嘉时代之潮流也。朴学创始于清初顾炎武。当明清易代、学术更新之际,炎武倡导学者舍宋明语录而读孔孟遗经,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以一语概括曰:“经学即理学。”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戴震》篇申其意云:“夫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诸《六经》。”于是经学大兴,为朴学之中心。

乾嘉朴学家反对宋学“凿空说经”,本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之训,瘁力于《尔雅》、《说文》等学。清代经师无所不学,造诣浩瀚,而其最精者卒在小学。

乾嘉经师长于考证,目的“实事求是”。其术如法官治狱,广搜佐证,比较归纳,作出结论。胡适尝论清儒治学方法暗合科学。

乾嘉朴学之主流为“惠、戴之学”。汪中为李惇撰《墓铭》云:“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汪中、焦循、阮元皆扬州人,继惠栋所创吴派、戴震所创皖派,共建扬州学派。昔贤尝论:吴学温故,皖学知新,扬学会通。我则谓吴、皖、扬三派乃是乾嘉经学连续三阶段:惠氏力复汉诂,戴氏功在明道,阮元等倡导实践,相继建成清学。由此可见,研究扬州学派,不能不上溯惠、戴,亦必触及整个清代朴学,其意义非仅阐明扬学而已也。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我即拟约集扬州师范学院同志,开展扬州学派研究,共振朴学之风。因“十年浩劫”,此事中断。直至上世纪80年代,始得偿愿。近岁又与台湾同仁开展交流。多位中青年积极

参与盛事，其一为刘子建臻。

建臻始学于安徽师范大学，其硕士学位论文为《周易研究》。我喜其不畏古奥，人才难得，力主接纳来扬州大学任历史讲师、副教授。2000年，建臻师事本校田汉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春暮，汉云、建臻偕扬大多位同事，赴台北参加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研讨会”，我亦从澳大利亚到会，相与参观傅斯年图书馆，睹高邮王念孙遗稿。于是建臻见闻益广，治学益勤。2003年6月，建臻得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清代扬州学派经学研究》，获专家赞许，谓能大量涉猎原著，系采山之铜。我主持答辩，喜观成功。论文旋经作者反复修饰，今梓行公之于世。

清代扬州经学渊懿奥衍。建臻初探之作，未免大醇小疵。但愿听读者评议，去风即雅可期焉。

二〇〇四年十月祁龙威序

概 论

近年来,扬州学派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内地,相继出版了《扬州学派新论》、《阮元传》、《阮元思想研究》和《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①等著述,《续修四库全书》则影印了一百七十余种扬州学派代表人物的重要著述,更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台湾,出版了《焦循研究》、《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焦循年谱新编》、《焦循雕菰楼易学研究》和《焦循手批十三经注疏研究》^②诸书,推出了《汪中集》、《刘寿曾集》和《汪喜孙著作集》^③等书目。同时,还发表了数十百计的研究论文,特别是2000年4月和2001年5月分别在扬州和台北召开的“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集中涌现出了一批质量不俗的学术论文,业已汇编出版了《清代扬州学术研究》^④一书,大大推动了对扬州学派的

① 赵航:《扬州学派新论》,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后在2003年由广陵书社出版的《扬州学派概论》,略加修订;王章涛:《阮元传》,黄山书社1994年版;李成良:《阮元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陈居渊:《焦循儒学思想与易学研究》,齐鲁书社2000年版。

② 何泽恒:《焦循研究》,台北大安出版社1990年版;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1994年台北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2)。赖贵三:《焦循年谱新谱》,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版;《焦循雕菰楼易学研究》,台北里仁书局1994年版;《焦循手批十三经注疏研究》,台北里仁书局2000年版。

③ 林庆彰、蒋秋华编审,王清信、叶纯芳点校:《汪中集》;杨晋龙校订、林子雄点校:《刘寿曾集》;杨晋龙主编:《汪喜孙著作集》。这三种均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分别在2000年、2001年和2003年出版。

④ 祁龙威、林庆彰主编:《清代扬州学术研究》,台湾学生书局2001年版,为扬州会议的学术论文集。2001年台北会议论文集即将出版。

研究。这里,先就扬州学派概念的来龙去脉、扬州学派的成因、代表人物的界定、主要的经学成就、治学宗旨及其影响,作一简要的概括。

—

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第一次使用了扬州学派的术语:

卷中之上:“且汪氏既斥《大学》,欲废《四子书》之名,而作《墨子表微序》,顾极尊墨子,真颠倒邪见也。……后来扬州学派著书,皆祖此论。”

卷下:“扬州汪氏,谓文之衰自昌黎始,其后,扬州学派皆主此论,力抵八家之文为伪体。”

显而易见,方东树在提出“扬州学派”这一术语之时,以“极尊墨子”和“力抵八家之文为伪体”两点为立论的前提。看起来,矛头仅指汪中,实则指向汪中和江藩两人。

汪中对诸子深有研究,除《墨子表微序》^①而外,汪中还著有《荀卿子通论》、《墨子后序》、《老子考异》、《吕氏春秋序》和《贾谊新书序》等文。

这些文章,开创了清代子学研究的新局面。

后来扬州学派著书,是否“皆祖此论”或者“皆主此论”,姑且不论,问题是,方东树在提出“扬州学派”这一术语时,为什么在其靶心上的人物会是汪中和江藩呢?

这是有缘由的。

第一,汪中是最早关注清中叶扬州学术发展走向的人物。

大约在乾隆五十年前,汪中已经注意到扬州一域业已形成“古学”研究的新群体。在为学友李惇所撰的《大清故候选知县李君

^①《述学》作《墨子序》:“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而为之叙。”

之铭》中,汪中就曾指出:“是时,古学大兴,元和惠氏、休宁戴氏,咸为学者所宗。自江以北,则王念孙为之唱,而君和之,中及刘台拱继之。并才力所诣,各成其学,虽有讲习,不相依附。”这段话十分重要,其要义有三:一是说明扬州学者是吴、皖两大学术流派的继承者;二是道出了扬州学术群体的形成且“各成其学”;三是点明了“江以北”这一新近兴起的学术区域。在汪中看来,在“江以北”的王念孙、李惇、刘台拱和汪中,已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又一中心。由于王念孙、李惇是高邮人,刘台拱是宝应人,汪中是江都人,三地同为扬州所辖,所以,这里的“江以北”显然指的就是扬州。

汪中能注意到清代学术史特别是扬州一地的学术风貌,绝非偶然。因为研究学术史,是汪中的一大特长。此前,汪中在写给刘台拱的信中,就有“中之志,乃在《述学》一书”^①的志愿,从《汪氏学行记》所载《述学》^②的构架来看,汪中想完成的《述学》,就是想梳理周代的学术思想且为此而努力着。正是以学术史家特有的卓识,汪中敏锐地体察到了“江以北”这一地域性学术群体的存在。而他们,正是后人常常提及的“扬州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

第二,江藩对“郡人”即扬州学术的全面论述。

继汪中之后综论清中叶扬州学术者为江藩,且汇集于《国朝汉学师承记》诸书之中。分析《国朝汉学师承记》所述人物,有两方面相当突出:一方面,卷一和卷八为汉学创始期人物,卷二、卷三为吴派,卷四人物在吴、皖之间,卷五、卷六为皖派,卷七则为“郡人”之学;另一方面,对“郡人”单独设卷的同时,正、附传中的扬州学者最多。在《国朝汉学师承记》里,在正传者 40 人,扬州学者有 14 人,多于 1/3,入附传者 62 人,扬州学者又有 13 人,占 1/5 还强;在正、附传中的 104 当中,扬州学者总有 27 人,居 1/4 以上。

① 汪中:《述学·别录·与端临书》。

② 见卷四所收徐有壬之《述学故书跋》。

扬州一府，竟有如此多的知名学者，不排除江藩对故里的偏爱，但也不能否认扬州学术之盛。更为重要的，是江藩并未把扬州学者简单视作皖派的组成部分，而是自成特色。其根据如下：

其一，与《明儒学案》一样，江藩主要是以师承和学术宗旨来划分学派的。由于王念孙师从戴震，为“亲受业者”，故在卷五《戴震》之后，附有王念孙和王引之的小传。

其二，卷六《任大椿》传中，以为“子田与东原同举于乡，于是习闻其论说，究心汉儒之学”，所以也归其为皖派，其族弟任兆麟亦然。相反，把与任大椿有着密切姻亲关系的兴化学者顾九苞、顾凤毛父子置于卷七当中。

其三，在卷五末尾，除王念孙、王引之而外，江藩对皖派人物作了列举：郑牧、方矩、程瑶田、汪龙、段玉裁、卢文弨、纪昀、邵晋涵、洪榜、汪元亮、孔广森、龚自珍。

其四，卷七的正传、附传人物共 24 人，几乎全是扬州学者，即使是“歙人”凌廷堪，也因“久客扬州”且学成于此而“记于郡人之末”。

也就在第七卷里，江藩提出了“郡人”的概念，并以“郡人”之学成卷。所涉学者，遍及扬州所辖之高邮、泰州和江都、甘泉、仪征、宝应、兴化等县。王念孙、王引之居高邮，任大椿家住兴化，难道就不是“郡人”？在江藩看来，他们是“郡人”，但不属“郡人”之学，故而列于“郡人”之外而置于皖派。自然，“郡人”之学亦非皖派所能包容了。

于是，江藩所谓的“郡人”，已不仅仅限于地域称呼，而是一个包含着特定内涵的学术概念。

显而易见，在汪中注重“江以北”这一学术群体之后，江藩更凸显了这一群体的存在。应该说，江藩没有提出扬州学派这个概念，但已经指出了有扬州学派这个经学流派的存在。

加上汪中对方苞的批评^①、江藩称赞汪中之文并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专录其《自序》一文、以及《国朝宋学渊源记》对桐城派的排斥等等因素,才有了桐城派后学方东树言辞偏激的《汉学商兑》一书,正如《清史列传》卷六九《江藩》所说,《国朝汉学师承记》问世,“方东树《汉学商兑》所由作也”。如前所述,也就在《汉学商兑》中,方东树便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扬州学派”这个术语。

倘若没有《国朝汉学师承记》对“郡人”的偏重且以之为经学流派,专事批驳《国朝汉学师承记》以及清代“汉学”的《汉学商兑》,怎么可能会突然提出“扬州学派”这一概念呢?换言之,认为“江以北”有这样一个学术的流派,江藩已在事实上作了认定,而方东树只是从概念上加以明确而已。

但是,“扬州学派”一词是由对手在攻击中提出的,其概念本身就包含着挖苦和讽刺。所以,尽管这是个概括相当准确的词汇,却也成了扬州学派几代人心中的块垒。扬州学派前期、中期到后期的代表人物中,始终没有人使用过这个概念。连深受影响的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也大多如此。

末了,当失去了当初争论特定的政治背景和文化环境之后,在摒弃了这个概念提出时所带有的敌意和辱骂色彩之时,后世学者便大多接受了这个提法。于是,梁启超、支伟成、钱玄同诸多学者,以及扬州籍学者李详等人,就开始广泛地使用“扬州学派”一词了。

二

总体上看,扬州学派的成因,主要与清代的文化政策和扬州特有的区域因素两方面有关。

扬州学派承吴、皖二派而起,形成于乾隆中期,势必也就和此

^① 如《述学》卷一《妇人无主答问》:“方苞侍郎家庙,不为妇人作主,以为礼也。”汪中正之。

时的文化政策关系密切。

与顺治、康熙、雍正一样,乾隆继位之初,仍以尊用宋学为主,对长于理学之臣鄂尔泰、张廷玉等人也倍加重用。但是,随着臣僚间明争暗斗的日以加剧和强化皇权的需要,乾隆便着力打击鄂尔泰势力,严惩张廷玉之党,渐渐便由冷遇理学大臣发展到疏远朱子学说。与此同时,对汉学则予以热情关注,越来越多的汉学家也受到礼遇和重用。这就与康熙、雍正时依靠理学臣僚的局面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从文化层面上讲,一方面,是基于入清以来学术发展基础之上的。尽管统治者尊崇宋学,但汉学并未停止发展,而“阎百诗、胡东樵一派之经学,承顾、黄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①。在这样的情势下,乾隆疏远宋学而关注汉学,是十分正常的事;另一方面,则基于此前持续不断的文化传承和学术积淀。譬如经学,曾先后出现过《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一经》、《十三经》、《十四经》等不尽相同的文献系列,这本身就是经学不断发展的外在标志,也是清代学术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王念孙、李惇、顾凤毛等人自幼学习《十三经》,就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朱彬、焦循、阮元、凌廷堪、刘文淇、刘宝楠等人更深于研究《十三经》,并著述宏富,更是在传承之上的重大发展。

而乾隆时期体现这种不同文化政策的具体举措,则主要以科举、书院、文字狱和《四库》开馆为杠杆。

科举中殿试策问的内容,无疑是文化政策的风向标。乾隆十年(1745年)的殿试题内容中,就有考察经学历史的题目。乾隆在十九年(1754年)的殿试题目已有了批评宋学和表彰汉学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很快,通过科举,就使一批又一批汉学家脱颖而出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7页。

出,甚至成为封疆大吏,如王鸣盛、纪昀、王昶、谢墉、朱筠、朱珪、钱大昕、毕沅、赵翼、陆费墀、任大椿、邵晋涵、孔广森、程晋芳、孔继涵、阮元等等。至于在乡试或会试中因友朋同考而进行学术的交流,以及部分学者以应考成功为目的刊刻的著述,也都有功于学术的发展,如汪中的《策略謏闻》、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焦循的《群经宫室图》等,对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功不可没。当然,科举对于扬州学派诸多学者来说,是一种残酷的折磨。焦循经历了十一次乡试^①,薛传均、刘毓崧十次乡试,钟怀应省试十三次,刘文淇更是经历了十四次秋闱的折磨,疲于奔命的科考对他们学术事业的影响不可小视。

书院在乾隆时期发展迅速。就扬州而言,所建书院众多,如郡城的安定书院、梅花书院、广陵书院、维扬书院、敬亭书院,仪征的乐仪书院,高邮的珠湖书院,兴化的文正书院,宝应的画川书院,泰州的胡公书院等。在扬州学派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书院的作用不可或缺。一是“院长旧多大师”^②,安定、梅花等书院就荟萃了王竣、杭世骏、蒋士铨、吉梦熊、姚鼐、蒋宗海、胡长龄、赵翼和吴锡麒等等学者名流,使就读者受益匪浅。即使像仕途不达的杭世骏,在安定书院主讲时,强调“学古之道,其言必期于有用”^③,对汪中学术的提升有着深远的意义;二是院长与学术界的联系广泛,通过院长,在书院肄业者往往能够较快地了解和阅读当时的学术成果,焦循“读书安定书院,王光禄(鸣盛)新刻《尚书后案》成,以数十部寄院长丹徒吉渭岩先生,属示诸肄业者”^④,就是其中一例;三是,对贫苦人家的子弟,在书院就读,因为“正课月给膏火三两,附课一两,住院肄业

① 焦循:《里堂书札·寄汤价人师》:“循年四十,历乡试十一次,已分老于胶庠。”又:《雕菰集》卷三《天界寺》:“我游金陵十一次。”

② 《清史列传》卷六九《李联琇》。

③ 杭世骏:《述学·袁盐船文序》

④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见载《焦氏遗书》卷末。

者,于常额外日增膏火三分”^①。汪中、刘文淇等人因之不受饥饿困扰而一心读书。而李惇主讲于暨阳书院,凌廷堪主讲于敬亭书院和紫阳书院,江藩主讲于丽正书院,汪喜孙主讲于覃怀书院,刘恭冕主讲于经心书院,以及阮元创建诂经精舍、安澜书院和学海堂,更使书院成为汉学家培育英才的重要场所。如果说乾隆中后期的会试和殿试是汉学家步入仕途的龙门,那么,书院就是培育汉学人才的摇篮。

文字狱、《四库全书》的编纂和清代学术间的关系,向为学者关注。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文字狱正盛之时,也是《四库全书》正在编纂之时,更是乾隆力倡汉学之时。这已经反映出了文祸、《四库》开馆与清代学术之间的深切关联。而《四库全书》修纂的过程,也正是以汪中、王念孙、刘台拱、李惇、任大椿等为主的扬州学派趋于形成的前期阶段。何况,参与修撰《四库全书》的诸多人物不少还是扬州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座师和幕主,汪中、王念孙为纂修官朱筠的幕宾,王念孙又是纂修兼分校官戴震的弟子,李惇曾入副总裁彭元瑞幕,并与顾九苞、江德量同为总阅官德保的门生,阮元、凌廷堪和王引之一并都以总阅官朱珪为座主,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一书为四库馆总纂纪昀击节叹赏;纂修兼分校官吴赐麒后来主讲于扬州的安定书院和仪征的乐仪书院,冯集梧也曾主讲于安定书院。四库馆副总裁刘墉在任江苏学政时,曾取焦循为附学生,并有“不学经,何以足用”^②的教诲,焦循心存感激,还专门撰写了《感大人赋》一文且置于《雕菰集》首篇,而刘墉恰恰又是文字狱的急先锋人物,乾隆二十六年沛县监生阎大鏞《俟俟集》不避庙讳案就是由刘墉上奏的,乾隆四十三年八月扬州府东台县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丹徒县生员殷宝山《岫亭草》记述明朝国姓案也是刘墉经手而

① 《两淮盐法志》卷五三《书院》。

② 焦循:《雕菰集》卷一《感大人赋序》。

参与查办的。由此可见,众多而且残酷的文字狱,以及大规模编纂《四库全书》,是扬州学派形成和发展时期最为密切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背景。

修成后的《四库全书》对扬州学派所产生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汪中管理文宗阁并写成《文宗阁杂记》、凌廷堪撰写《礼经释例》之前的翻检《四库书存目》,阮元仿《四库提要》之式而著成首部续补《四库全书》之书——《四库未收书书目提要》等等,便是有力的证明。

上述一并说明,乾隆时期的文化政策,是扬州学派经学形成乃至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从本质上说,这一因素的作用是外在的。它不能也无法解释这些文化政策在统一面向全国的同时,却为什么唯独在扬州能形成扬州学派这个问题。因此,扬州学派的形成和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区域文化因素。可概括为如下六点:

其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处于长江下游北岸且与大运河交汇的扬州,向北可通京师,往南能达浙、闽,东面近于大海,西面直通两湖,交通便捷,“利尽四海”^①,地理位置非常优越。作为“襟带淮泗,控引江海”^②的漕运要津,在运河繁忙之时,每年从扬州经过的粮船、盐船和商船数以万计,作为漕运的枢纽、盐运的中心和货物的集散地,势所必然使扬州成为清前期最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在此基础上,扬州更成为清代绘画、雕版印刷等领域的文化中心。也由于“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③,途经扬州或曾寓其间的文人墨客更是不计其数,惠栋和戴震这两位学术大师的唯一会面就在扬州,就相当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对扬州学派学术

① 汪中:《述学·外篇·广陵对》。

② 刘寿曾主纂:《光绪江都县志》卷二一《列传第一》。

③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〇。

文化发展的作用是十分重大的。这些,都是扬州学派得以产生的重要前提。反之,当道光间改盐引为票,盐业中心北移,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又使运河阻塞,同治年间漕运已十分之九改为海运之后,扬州的交通优势已经丧失,加上咸丰间兵灾的严重破坏,经济随之趋于衰退。扬州学派经学于此时迅即衰微。

其二,深厚的文化积淀。扬州悠久的文化和众多的人文资源孕育了扬州学派,扬州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重大事件、地理沿革、山水形貌、名胜古迹和亭园街巷等等,均为扬州学派治学的宝贵素材,相关的内容在其著述中俯拾即是。这当中,尤以“选学”和“许学”为著。以李善为中心的“选学”规模宏大,泽被后人。扬州学者多在“选学”陶冶下成长,任大椿“少年为《文选》”^①、凌廷堪“少好六朝辞赋,为文喜作《选》体”^②即是。因自小学习《文选》长而有志于此者有之,阮元幼时师从胡廷森且“授元以《文选》之学”^③,后来“为《经籍纂诂》二百十二卷,犹此志也”^④,便是其中之显例。研究《文选》并专有所论者也不乏其人,如王念孙《读书杂志·余编》中,就收有“《文选》一百一十五条”,薛传均还著有《文选古字通疏证》一书。之所以如此,就与“选学”传统密不可分,用刘毓崧的话说:“广陵选学之盛,其师承良有自矣。”^⑤“许学”又如何呢?扬州“二徐”的“许学”成就,备受后世称道,扬州学人深受沾溉自不待言。举两例以概其余,除《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多引“二徐”之说而外,王念孙的《王氏读说文记》就为订正徐锴之书而作,宝应学者朱士端的《说文校定本》,更是“二徐”之功臣。虽然,“选学”和“许学”的影响不止扬州一域,但扬州受其遗泽独深。故此,焦循在《雕菰集》卷一三《复姚秋农

① 章学诚:《任君大椿别传》,载《碑传集》卷五六。

②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二二《上洗马翁覃溪师书》。

③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二《胡西琴先生墓志铭》。

④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二《扬州隋文选楼记》。

⑤ 刘毓崧:《通义堂文集》卷一三《文选古字通疏证序》。

先生书》中讲道：“扬州之学，如曹、李之于《文选》，二徐之于《说文》，此二书为万古之精华，而扬州泄之；为天下学者之性命，而广陵兼之。”

其三，渊源有自的家学。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崔浩与寇谦之》中指出：“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扬州学派亦然如此。宝应朱氏、王氏和刘氏之家学就相当显赫。朱克简曾“与诸生讲明朱子圣学”^①。其子朱约长于《易》学，其孙朱泽沅更是理学大家，撰有《礼记训纂》的朱彬为朱泽沅从孙；王懋竑与朱泽沅齐名，“少从叔父式丹学，刻励笃志，精研朱子之学”^②。王懋竑之子王箴传便是刘台拱的老师；刘氏之家学可上溯至明末，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刘台拱》中说：“君六世祖永澄问学于蕺山，以躬行实践为主，子孙世传其学。”刘台拱之父刘世蕃，“尤深于朱子之学”^③。刘台拱弟刘台斗，“传经学于其父兄”^④。台拱为刘宝树和刘宝楠兄弟之从父。“高邮二王”承戴震之学为人所习知，其实，高邮王氏家学深厚。王念孙高祖王开运“治《尚书》有声”，曾祖王式相“博通五经”，祖王曾禄“理学湛深”。^⑤王安国与子王念孙、孙王引之继承先业并加发展，进而“成一家之学”。^⑥在仪征，阮氏尽管以习武进身为其家风，到了阮元父阮承信，善射而外还“治《左氏春秋》”。^⑦阮元身为显宦，精通经史，其长子阮常生，亦深经术，次子阮福承袭家学，精于治经；仪征刘氏三世治《左氏春秋》更为学人津津乐道。在江都和甘泉，学术世家亦多。除了汪中、汪喜孙父子，黄生、黄承吉祖孙，江恂、江

① 《清史列传》卷六七《儒林传上二·朱泽沅》。

② 《清史稿》卷四八〇《王懋竑》。

③ 刘台拱：《刘端临先生遗书》卷四《先府君行状》。

④ 阮元：《肇经室二集》卷六《江西铜鼓营同知刘台斗传》。

⑤ 《王念孙行状》，清刻本。

⑥ 《清史稿》卷三〇四《王安国》。

⑦ 阮元：《肇经室二集》卷二《雷塘阮表》。

德量父子,还有甘泉的焦家,焦源、焦镜、焦葱皆擅《易》学^①,至焦循终成一代《易》家。需要强调的是,家学往往也随风尚的变化而变化,刘台拱虽一生不弃宋学,仍然走过了从幼习程朱到专攻汉学的学术历程,任陈晋是从诗人转向宋学,而孙子任大椿则由工于词章变为研究汉学,这都具体地折射着乾隆中叶汉宋学影响力的消长。同样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传承吴、皖二派学术之外,家学也是扬州学派的一个重要成因。

其四,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若说家学只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单元,通过家族间相当复杂的姻亲关系,则把众多家族联结为紧密的整体,进而加强了学术的联系,这又是扬州学派能在乾隆中期而后有着如此庞大的阵容并迅速崛起的又一因素。为便直观,书末以图示之。而与之紧紧联系着的,是不可或缺的“贤母之教”。汪中家贫,“力不能就外傅读,母授以小学、《四子书》”^②。焦循为学始于母亲“口授《毛诗》及古孝弟忠信故事”,见载于《雕菰集》卷二三《先妣谢孺人传》当中,阮元学诗始于母亲之教,在《淮海英灵集》戊集卷四《林文珪》中亦有记,凌廷堪是在母亲“汝其游四方就师友以成之”^③的鼓励下,方才游学扬州而成其学问,而顾九苞之学,“母所教也”^④,刘宝楠“五岁而孤,母乔孺人躬自授经”^⑤。刘寿曾更是在“母必诃而撻之,夕则问所业”^⑥的严教中长大的。由此可见,贤母充当着启蒙的角色,的确确是他们人生的第一位良师。作为家族家学间联结的纽带,贤母的作用也就不可等闲视之。

其五,重朋亲友而相得益彰。文人相轻,古来有之。但在扬州学

①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四《通儒扬州焦君传》。

② 《光绪江都县续志》卷二四上《汪中》。

③ 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五《凌母王太孺人寿诗序》。

④ 《清史稿》卷二六九《顾凤毛》。

⑤ 戴望:《续碑传集》卷七四《故三河县知县刘君事状》。

⑥ 刘寿曾:《传雅堂集》卷三《先妣汪太宜人行述》。